

# 花落春仍在

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

瞿骏 著

# 花落春仍在

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

瞿骏 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 / 瞿骏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12

ISBN 978-7-108-06106-5

I. ①花… II. ①瞿…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112 号

责任编辑 成 华 王婧娅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 数 13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的是我自 2005 年以来写的小论文、随笔和书评。我是个手慢的人，所以别人的书是集腋成裘，我只能“集腋成袖”。同时也不敢说其中有何真知灼见，这有待读者来评判。唯一可说的是，书里每一篇文章确实都曾费过心力，下过功夫。

费心力和下功夫一方面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每日都与这段历史为伴，“吃饭家伙”岂有不郑重对待之理；一方面来自于自己那份莫名的“敬惜字纸”的意识，总觉得既是要见人面的文字，别人满不满意无从把握，但使别人满意的起点就在自己作文的诚意和心气；最后则关乎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关切，值得多说两句。

书名“花落春仍在”出自道光三十年(1850 年)庚戌科礼部覆试答卷。其时考题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云：

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  
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香。

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

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

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

白描烦画手，红瘦助吟肠。

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

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据说此诗曾得到曾国藩激赏，此试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铭心之科场一役。他凭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书斋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来正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提示我们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的历史。

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变”著称，但如何“察变”却是个到今日仍颇费人思量的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多看到的是变化后的模样（当然是否真是这等模样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变化的过程，更模糊的是变化前的模样。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我们恰恰对这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重视不够，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飘零于泥尘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而看不到既有的“春天”究竟是在还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既有“春天”的在与不在变得无关紧要（同时事实上依然还在），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心目中径自发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与自以为的“春天”，并为了他们的想

象和自以为而努力、奋斗，直到互搏与厮杀。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发展却不被人重视的既有“春天”和想象与自以为的未来“春天”就这样在现代中国交织掺杂在了一起。这种因交织掺杂而互渗联动的状态既造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困境，也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路。

从困境这一面来说，“落花飘零”即现代中国的“黑暗沉沦”确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但对于此种基本生存状态的回应方式，各人却有所不同，遂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革命、改良、接续、调和等多种方案和主义。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国之思想界分为“封建社会的回想的阵营、资本主义的模仿的壁垒和社会主义悬想的阵线”三大阵营。陶氏的说法与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见更深，且其立场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这些阵营、壁垒和阵线之中有坚持中国既有“春天”仍在且相当重要的，亦有笃信“落花飘零”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针锋相对、彼此对立，但其实它们大多都共享着同一个预设，即张灏所说的“前瞻意识”。这种“前瞻意识”让人对其身处的现实有强烈的沉沦感和疏离感，同时对缥缈的未来有无与伦比的热切盼望。我将其称为“一种近于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

而之所以“共享”，是因为不仅我们常称之为“激进”的那些主义有这种“前瞻意识”，那些曾几何时遭无数人激赏追捧的改良主义等也不乏这样的意识。这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别明白，其“革命”的目标之远、范围之广和着力之

深常令人感叹和咂舌,让人不禁要问,真的有改良派吗?究竟谁是革命派?

现代中国的三重连续性困境由此产生。第一,“新社会总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因此现代中国再如何“变”,总有事实上仍在的“春天”,又有读书人想象中的和自以为的未来“春天”。这常使时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赞成复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个搬过来”,该怎么办?

第二,正因为有此困惑,从中体西用开始,到调和新旧与接续中西,再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它们虽有各自立说的理据,但体现的都是一种以“新旧杂存”的方式来通向光明未来的尝试。张东荪对这种“新旧杂存”的思路做过有力的挑战,其挑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出所谓“新旧杂存”很多时候不过是新旧“共存”,更重要的是点明了无论是“杂存”还是“共存”大概都是长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旧的便汰去一分”。这种对“时间”力量的期待会让“前瞻意识”强烈的国人急躁而迫切。他们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期待是一种惰性,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则无奈地发现现实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长大,旧的不可以立刻消灭”,走向光明未来的路漫漫又长远。

第三,光明未来的遥远而不可得,让现代转型中的部分读书人一边经历着“落花飘零”的苦痛现实,一边愈发觉得我们无法依靠“时间”的力量来再获春天。郭沫若就警醒众人说:“不要以为春天去了,永远会要再来!”因此他们从盼望新的春天转换成要主动创造新的春天,要一换而过的是种子,是土壤,甚至是气

候。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对那些正在养花以收获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视或无意忽略的态度，进而常常期盼调换一批更善于养花，乃至能呼风唤雨、创造春天之人。但历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调换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坏）。可是这样一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却演化成为一个循环路径：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国民党统治下怀念北洋，时至今日则有“晚清风度”“北洋精神”“民国范儿”等林林总总的“旧日重现”。其实质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助谈历史而对现实形成一种批判。但这些批判常常忽视了一个基本逻辑：若对旧日的怀念成为循环和常态，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从新路这一面来说，尽管近代中国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个主权大致完整，疆域范围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众多，文化有“一线之续”且有进一步复苏迹象的中国仍在那里，这对一个经历过“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古老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从这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奇迹中显示出我们一定有新路可走。这条路不是简单的“脱亚入欧”或者是成为东西洋列强标准中的“民族国家”，因为历史和现实已经说明“脱亚入欧”或是成为“民族国家”的短暂成功与长期虚妄，而且在追寻这虚妄的过程中，对自身和对别国都有无穷的流弊。中国的新路某种意义上正蕴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杨国强教授说的：“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

这句话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不能不”表明“旧有”与“新来”的共存很多时候不是能够人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从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



面’，稍一碰撞就会化为灰烬！”这种共存是我们脱不开的“既存状态”，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机。对历史长河来说，百年不过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许是造成我们无穷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获得生机的源泉。中国“旧有的历史”在今日绝不只是我们要卸之而后快的包袱，相反，它能为我们已经贫乏至极的政治、社会想象提供鲜活的养分。康有为、钱穆、章太炎、陈嘉异、闻一多、陈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论述尤能说明这一点。他们的价值既在今朝，更在未来。

1907年鲁迅曾说：“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历史环境看，鲁迅之说无疑比那些东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轻发的高蹈言论深刻得多。但一百一十年过去，中国似并未“沉沦”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国本体自发究竟为何，中西交通传来的是否仅是“新疫”，特别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产出何物等都仍是一个个“进行中的问题”，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寻与讨论。

这是一场长程的竞赛，且经常不以成败来论英雄！

本书能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要感谢责任编辑王婧娅的牵线搭桥与认真仔细的工作。书中各文蒙吴彬老师、王立嘉老师和黄晓峰、张明扬、任思蕴、饶佳荣、饶淑荣、叶祝弟、阮凯、张洪彬、周奇、石伟杰诸友不弃，曾先期发表于《读书》《浙江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探索与争鸣》《文史知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文汇报·文汇学人》和澎湃新闻等各家报刊媒

体。其中多篇的成稿有赖于许纪霖师和杨国强教授每年耗费心力和体力组织的专门面向年轻人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既有学问思想的碰撞，又有旧雨新知欢聚的喜悦。不少文章背后的人与故事，待日后慢慢细说。

发表于2009年的《特立独行的士人与世相》（收入本书改名为《一部特立独行之书——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是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据闻当时罗志田教授已写好杨国强教授大著的评论，要在《读书》上发表，但为玉成年轻人的习作，遂将大作另投他处。罗老师是最适合论评杨著的学者，文章无论发表于何处，都是我们竞读争阅的宏文。我的文章不过是谈了些不上台面的学习体会，此次借陋作出版的机会，附记于此，以感谢罗老师提携后进的美意与厚心。

# 目 录

- 001 文明的痛苦与幸福:对辛亥革命的一个解读
- 012 宣统三年的读经“攻防战”
- 022 “共和”的通俗化:清末民初的“新”三字经
- 034 民族主义的可贵与可爱
- 044 八卦世界:辛亥革命时期的谣言
- 054 倒皇人是保皇人:梁启超与民初复辟
- 067 新文化的“到手”与“人心”
- 080 李无隅:一个五四青年的生与死
- 092 胡适、“园丁”与《燃犀》
- 112 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走向(二题)
- 121 中国城市问题的历史视野(二题)
- 136 19世纪末的小说征文比赛  
——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 145 一部特立独行之书  
——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 153 “民史”的写法  
——读《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
- 161 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实践  
——读《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 169 地方的解剖术  
——读《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 183 附录 访谈：清末民初读书人的转型

## 文明的痛苦与幸福： 对辛亥革命的一个解读

电影《十月围城》散场在即，敌我双方奋力厮杀，几经缠斗，牺牲了数十条性命后，神秘的中山先生终现真容，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此语的确切出处笔者至今尚未找到，但中山先生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类似的话。如推演这些话的内在逻辑，大致是列宁革命论中“为求达到目的，不得不付出代价”的中国版本。因此这套逻辑适合于职业革命家的宣传与鼓动，但比照辛亥革命的历史实态，则有些不相凿枘。

其实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福”的地方并不少。若没有电报、火轮船、印刷机、蒸汽机车等技术发明，“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闻”，反满的文章如何四处传播？进而如何让阅报读刊的少年们心痛、肉颤、血枯、泪竭，让“清吏震惊，党人气盛”？若没有清末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本该是“国之柱石”的人物又怎能反戈一击，由“各省响应革命”的带头人再变为“民国元勋”？更不用说创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县学堂培养出的新军、新学生，正是他们与不少毕业

速成的留日学生一起直接构成了革命的血肉。胡先骕就回忆说：“辛亥革命之秋，尝见市上有一种极可笑之图画，以张文襄派遣学生出洋为有心颠覆清室张本。”

以上种种呼应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个颇发人深省的观点：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之幸福”正是革命的肇因，而非其结果。

再来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被称为“北洋时代”，这个“北洋时代”至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在这段时间内既有国体之争的“共和危机”，又有边陲思分的民族危机，还有凄苦无告的民生危机。从某个侧面望去“北洋时代”中人确如鲁迅所言，身处铁屋之中，觅不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1912年报纸上已有人抱怨：“革命而后，万口同声之所谓共和幸福，盖皆指将来而言，非谓今已有丝毫及于吾民。”梁漱溟之父梁济更是指出：“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亦可谓变通之举，乃不惟无幸福可言，而且祸害日酷，且不止祸害一时而已。”另有一篇小学生作文里也写道：“十月十日是我们脱离专制的日子，也是中华民国诞生的日子。我们国民虽不曾享到共和的幸福，却已做了共和的国民。”连中山先生自己都承认：“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

可见经过文明之痛苦，未必就有文明之幸福。我们要继续问的是，这些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与辛亥有怎样的关联？至今在人心根深蒂固的解释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软弱、不妥协、够彻

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机。这里暂且不说不彻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横扫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被诟病，就连看似为定论的“不彻底”亦可重新做一番讨论。

辛亥前十余年已是一个变化得太剧烈的年代。比如为士绅的产生画上休止符的科举停废，不少论者就以为其影响要比革命大得多。丁文江在1912年给莫理循的信中感叹：“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从《时报》上广为人引用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等一系列“兴灭”现象也能部分看出，清末变革与辛亥革命两相叠加所造成的政治、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巨大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同时也是日后造成危机的根源：军阀的兴起可上溯至清末各地编练的新军；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见对“民生”的体恤；清王朝覆灭，一套依据不同族群来区别治理的边疆控制技术亦随之消失等都是显著的例证。

而且变化的“彻底”程度随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异甚大。以袁世凯称帝事论，顾颉刚就注意到当时“一般社会”以袁称帝为“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何以如此？据顾氏分析是因为在这些人的脑海中“世界进化观念没有一毫一乎的存在”。读书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现了总拿来作“辛亥革命不彻底”证据的阿Q与“柿油党”之类的事。

可是只要把目光延伸至鲁迅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在

通常被认为彻底的革命中，“阿 Q”们的痕迹也一样不少。比如 1949 年 6 月，底层因抗捐而起的民变中会冒出“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这样政治极不正确，却很难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号。即使是真正的敌人煽惑，其运用的资源虽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至”等新讯息，但亦有相当多的“旧物”。1950 年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传开，江苏省吴县城墙根就挖出了当年颇为辛亥革命推波助澜的“烧饼歌”歌诀，以证新中国将“亡”。而在“土改”中对贫雇农最具吸引力的除了土地外，还有“宁式床”的诱惑——地主的浮财、底财。可见革命虽然斗转星移，但升斗小民仍是不太理会何为世界进化，何为真正的革命。对他们来说，生活境遇的优劣便是政治好坏的标准，怪力乱神则深深嵌入其日常生活之中。塑造他们，对历次革命的发起者而言就成了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从辛亥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中衍生出来的想象性问题还有很多：它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有无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是总想把辛亥作为一种革命殊象来讨论的执着。而这种执着从其形成过程看来来自于多方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从日本鼓吹“东亚之孟禄(Monroe)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建构自身合法性，从国民党欲勾连民族革命至国民革命的谱系到各党都意图要证明“救中国”者舍我其谁。

上述力量一起将“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证了历史的不断进化中各阶段高低不同的观念有多长久的生命力。其实 20 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相距不过三十八



年，“湍急的历史三峡”至今还未漂过，又何必着急将“中国革命”软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样的话虽然经不起史实的推敲，却可以提醒我们如何以不同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辛亥和 20 世纪中国革命，暂且可称这一视野为中国现代转型。

从此视野看，1911 年、1928 年、1949 年自然都代表着一个旧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政权的开始，随之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断裂，但其延续性却一直是被忽视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几十年中至少有两种延续性有显著的表现。

第一种是由现代转型之痛苦带来的延续性。现代西方的兴起从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个偶然一手借坚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变成所谓贫弱之国必须要遵从的世界潮流，从个人到国家的痛苦也就从一个个“高贵的谎言”渐渐变幻为人心中貌似真切的东西。从太平天国后的自强运动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毛泽东、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搅动过时代。他们之所以能搅动时代，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其承受着近代变局所带来的剧痛。可以说无痛苦不会思改革，无痛苦不会求变法，无痛苦不会干革命。正是在巨大的痛苦中，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了、推进了，革命的延续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这段历史中的几个片段，或许会发现这种延续性的另外一面：

19 世纪 50 年代末，正踌躇满志欲灭长毛的胡林翼在长江边驰马，乍见两艘火轮船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望其项